

# 「量入為出」原則不可偏離

□吳明錄

曾俊華在過去的四份預算案中，已就多項紓困措施動用了超過 1400 億元，是回歸以來在這方面最慷慨的財政司司長。因此，新預算案及特區政府今後的預算案，都大可不必過分「派糖」而偏離「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以免使財儲豐厚的香港步歐美國家債務危機的後塵。



## 指點香江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今日公布二〇一二至一三年度特區政府的財政預算案。由於本屆政府只剩下短短五個月的任期，七月份上任的新一屆政府或有新的鴻圖大計，因此曾俊華這份最後的預算案雖備受各方矚目，但估計不會採用人意表的新招數，而是繼續沿用以往的紓困措施，穩中求勝。

### 預算案要穩中求勝

香港經濟在去年上半年受惠於強勁的本地需求而實質擴張 6.3%，下半年雖受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惡化、全球經濟氣氛轉壞影響有所放緩，但全年預計仍將會增長 5.5% 左右，高於曾俊華去年初在制訂二〇一一至一二年度財政預算案時所作的 4-5% 的經濟增長率預測。經濟增長並未如預期般大幅放緩，特別是實地及利得稅收入均比預期理想，相信政府二〇一一至一二年度的財政盈餘將達至 550 億元左右，雖較上一年度的盈餘為少，但遠多於去年預算的 39 億元，與之後預料的 85 億元赤字相比更有天壤之別。而政府的財政儲備將會增加到 6500 億元左右的水平，約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的 35%，或二十四個月的政府開支。

財政狀況遠較預期理想，給政府提供了較多改善民生的政策選擇，社會上自然有更多的聲音希望政府在新預算案中減稅「派糖」以回饋市民、扶貧

紓困。和往年一樣，在最近一段時間裡，不少政黨、團體及專業人士和組織，通過各種方式對新預算案表達了不同的訴求。綜合有關意見，較多人期望的紓困措施包括：為住戶繼續提供電費補貼，減免全年差餉（以每季 1500 元為限），公屋減租兩個月，以及多派發一個月綜援金和生果金等。這些都是特首曾蔭權在去年十月《施政報告》中宣布的一些一次性紓困措施，也是曾俊華在前幾份預算案裡做過的例牌「派糖」措施，行政執行上較為簡單，而且不涉及政府未來的財政負擔。對於上訴求預計曾俊華在新預算案中會照單全納，以求皆大歡喜。

上述措施雖也可部分地惠及中產階層，但受惠最大的當然是無房、不納稅的基層市民，對中產階層影響更大的是薪俸稅和利得稅。現時政府財政相當充裕，因此近期有不少意見認為政府應調整薪俸稅，對財富進行較多的再分配，以減輕中產人士的負擔，真正做到「還富於民」「藏富於民」。

### 不妨接納退稅訴求

有關的建議包括將個人免稅額由現時的 10.8 萬元調升至 12 萬元，豁免納稅人去年四分之三的新俸稅或向每名納稅人退稅 8 千元，進一步提高子女及供養父母免稅額，放寬供樓利息可扣稅的上限及時限等。也有建議支持將香港的利得稅稅率由現時的 16.5% 減至與薪俸稅標準稅率看齊的 15% 或更低，以進一步支援中產及提升香港競爭力；或設立累進的利得稅稅率制度，以減輕中小企在高租金環境下的經營負擔。

由於退稅屬於一次性的惠及中產階層的措施，不會變更薪俸稅的結構，財政司司長不妨在新預算案中接納這一社會上呼聲甚高的訴求。但對於那些涉及到薪俸稅結構調整的措施，特別是降低薪俸稅 15% 的標準稅率及提高子女及供養父母免稅額訴求，特區政府則必須慎重考慮，不應倉促採納。因為調整薪俸稅與利得稅的結構對政府來說是一種相當大的承擔，會長遠影響政府的財政收入及本港財政體系的穩健。希望曾俊華在制定新預算案時，一定

要像香港回歸以來所推出的絕大部分預算案一樣，在維持政府穩健財政和回應大眾訴求的原則下作出穩妥的平衡，繼續堅守「審慎理財、量入為出」這一《基本法》為香港所定下的實事求是的理財哲學。

事實上，在上一份預算案中，曾俊華已經把納稅人供養父母或祖父母的免稅額增加兩成，由 3 萬元增加至 3.6 萬元；也同時把納稅人的子女免稅額提高兩成，由每名子女 5 萬元增加至 6 萬元。這兩項寬減措施已經使大部分納稅人受惠，使香港本就不非常狹窄的稅基變得更为狹窄。因此新預算案再增加子女及供養父母免稅的空間已相當小。

同時，由於本港稅基狹窄，現時大部分在職人士所交稅的稅率都比較低、稅額小，降低薪俸稅標準稅率及提高個人免稅額對普通在職人士來說雖是好消息，但實際上幫助並不太大，特別是對於未有顯著加薪的基層，幫助更是有限，反而受惠最大的是那些年薪過百萬的高薪一族，這也許是很多要求政府減稅的中低層人士及聲稱代表他們的政黨與組織所「不願見到」的結果。

### 擴闊稅階有利中產

對普通在職人士特別是中產階層幫助更大的，可能是調低薪俸稅的邊際稅率與擴闊稅階，這不僅使每個納稅人都可受惠，同時又維持現有薪俸稅結構與稅率水平，以免進一步收窄稅基，而且現時年薪過百萬的高薪一族將繼續按稍高的稅率繳稅，符合「能者多付」的原則，因此應該是在審慎理財的基礎上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可以重點考慮的「還富於民」方法。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現代化的富裕與法制社會的一分子，廣大的香港市民不可以既要政府低稅收甚至免稅，又要政府替社會大眾提供物美價廉的服務，如充足的福利和優質的醫療、教育等，這也是不合情理的。曾俊華在過去的四份預算案中，已就多項紓困措施動用了超過 1400 億元，是回歸以來在這方面最慷慨的財政司司長，香港社會對此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曾俊華的新預算案及特區政府今後的預算案，都大可不必過分「派糖」而偏離「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以免使財儲豐厚的香港步歐美國家債務危機的後塵。

作者為浸大聯合國際學院副教授，博士

## 社會思潮需要正確引導

□周八駿

於「自由行」的報道。一方面，引述經濟學者的話，肯定如無「自由行」則香港失業率會由現時的 3.3% 推高至 5%，增加約 7 萬人失業；但另一方面，引述該報民調結果，稱每 3 個香港居民中有 1 人抗拒內地「自由行」遊客，並引述另一位學者的話：「自由行」對本港的邊際效用已在遞減，政府須處理其附帶損害。

誠然，任何一項政策措施都有正負兩方面效應，在決定是否實施時，必須以其正效應大於負效應為考量；任何一項政策措施正負兩方面效應會隨時座標轉換而發生更替，必須與時俱進地加以修訂甚至取消。這些都是公共政策常識。同樣是公共政策常識的還有，評價任何一項涉及兩個或以上經濟單元相互關係的政策措施，不能僅從其中一方的利害得失考慮，而是必須顧及雙邊或多邊關係。

如果對待內地居民「自由行」是採取吳靄儀為代表的觀點，特區政府相信「自由行」對本港的邊際效用已遞減，是必須處理其附帶損害的時候了，那麼香港與內地關係將會向哪一個方向演變？香港將從中獲益或受損？這是不必高深學問就會解答的問題。

### 摒棄「積極不干預」

香港社會最近發生一系列對待內地同胞有偏見或成見的事例，不是偶然的，而是香港與內地融合深入拓展所伴生的必然現象。出現這一類現象不可怕也不必憂，倒是香港思想引導缺位是一個必須引起特區政府高度重視的問題。

然而，實際情形恰恰就是，香港的所謂主流媒體在報道和評論有關事件和問題時欠客觀公正，以致不實之言流傳，惡化或毒化香港居民與內地同胞之間的關係。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主任雷鼎鳴指出，內地遊客對香港是效益大於損失，令香港人產生抗拒的是兩大深層次矛盾，一是內地經濟急速增長令經濟有限的香港產生「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之感；二是香港土地不足，受惠於「自由行」的零售業都要交貴租，最受惠的是業主，市民大眾未必感受內地旅客帶來好處。這意見值得特區政府重視並採取相應對策。

實踐證明，不僅向知識經濟轉型需要特區政府摒棄「積極不干預主義」，看來，惟有待下任行政長官和下一屆特區政府了；而且，引導香港居民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也是特區政府必須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 中日關係陰影又聚

□林華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本來中日關係應該迎來一個良好局面。然而，新年伊始，日本針對釣魚島的動作頻頻，將中日關係推向低谷。

日本在釣魚島挑起事端，並插手南海事務，其動機是回歸亞洲、制衡中國，以圖謀與美國來共同擔負起領導未來亞太地區的重要責任。因此，中國在解決釣魚島及南海爭端時，一定要盡量淡化「美國因素」，把解決南海問題的對象限定在東南亞地區，區別對待在南海問題上表態的所謂「關切國」，避免自我營造出不利於自身的外部環境。

### 日命名釣島再挑事端

早前，先是日本右翼分子登上中國的固有領土釣魚島，後是日本將對包括釣魚島在內的 39 座島嶼進行重新命名。日本媒體 1 月 16 日消息稱，日本政府計劃在 2012 年內完成 39 座離島的命名工作，這其中就包括釣魚島及附近的數座島嶼，部分小島位於 2010 年 9 月發生中日撞船事件的水域。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重申對釣魚島的主權。聲明說，中國已就日本命名釣魚島島嶼計劃提出嚴正交涉，日本對釣魚島採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非法和無效的。

在此之前的 1 月 3 日上午，日本石垣市議員仲間均、仲嶺忠師以及 2 名沖繩當地居民相繼乘坐漁船登上了釣魚島，並在該島上停留大約 2 個半小時後離開，於 3 日晚返回了沖繩縣石垣港。目前，日本沖繩八重山警署以「無許可登陸」為由，認定這 4 人涉嫌「輕度違反犯罪法」，已介入事件的調查。

2010 年發生的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嚴重衝擊雙邊關係，此後中國漁政船強化了在釣魚島海域周邊的巡航；日本海上保安廳則頻繁指控中國船隻「侵入」日本領海，並出動多艘巡邏船進行攔截和監視。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對於中日兩國來說都是值得慶祝的一年。本來中日關係應該迎來一個良好局面，日本首相去年 12 月來華訪問示好，如今又將中日關係推向低谷。

日本與菲律賓兩國政府日前舉行有關亞洲地區海洋安全問題的首次副司局級磋商，如何應對中國在東海和南海海域主權主張，成為了雙方本次磋商的一個主要議題。中國與菲律賓之間就南沙群島主權問題存在爭議，而南海對於日本而言也是重要的海上通道，在東海問題上，中日兩國因為釣魚島問題也摩擦不斷。對於日本來說，企圖通過插手南海事務，牽制和對抗中國，增加其在釣魚島問題上對華談判的籌碼，並在國際社會營造對華輿論的壓制態勢。

### 圖與美聯手制衡東亞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計劃向亞太國家提出呼籲，共同簽署一份《太平洋宣言》，以便尋求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穩定，強化相互之間的合作，建立解決國與國之間糾紛的原則與方針。野田佳彥的這一構想，目的是要廢除鳩山內閣提出的建立「東亞共同體」的計劃，讓日本與美國來共同擔負起領導未來亞太地區的重要責任。《太平洋宣言》構想基本上沿用美國政府提倡的經濟與安保領域的「亞太地區轉變」的構想，其具體的內容是：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加盟的 21 個國家和地區中，實現經濟與安保兩大領域關係的全面強化。

針對釣魚島問題，中國曾多次發表主權聲明。但每每是這樣，日本政府總是會通過各種手段挑起事端。為此，中國應以強有力的措施來反擊日本的挑釁。

中國在解決釣魚島及南海爭端之時，一定要考慮到「美國因素」的存在。美國常在此間上下其手，把釣魚島等問題當作挑撥中日關係的籌碼，企圖渾水摸魚。南海問題是觀察美國複雜心態、政策取向的一面鏡子。

因此，中國所要做的是盡量淡化「美國因素」，應堅定「南海問題是中國與東南亞相關國家之間的問題」這一原則不動搖，把解決南海問題的對象限定在東南亞地區，區別對待在南海問題上表態的所謂「關切國」，避免自我營造出不利於自身的外部環境。



切勿中計

黃牛

## 以「新思維」處理敏感案件

□陳群



## 神州點面

不久前內地媒體刊登「最高檢將加強評估熱點敏感案件風險」一文，談到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關於充分發揮檢察職能參與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意見》，提出了「積極構建從源頭上有效化解和防範社會矛盾」的三大機制。筆者以為，在我國社會矛盾凸顯期，妥善處理重大敏感案件成為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的重中之重。

### 矛盾呈現聚集態勢

隨着國家「濃縮式」發展，社會矛盾亦呈「聚集式」凸顯態勢，涉及政治類、維權類、熱炒類等重大敏感案件，如涉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傷害罪、妨害公務罪、間諜罪等等，均構成社會重大風險。《人民法院報》刊登了「2010 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涉黑案、律師李莊偽造證據妨害作證案、南京副教授聚眾淫亂案、河南平頂山「9·8」礦難案、謝晉遺孀訴宋祖德侵奪名譽權案、廣東省政協原主席陳紹基受賄案、廣東中谷糖業破產重組案、冒用羅彩霞之名入學維權案、山西蒲縣原煤炭局長敘財數億案、上海泰夢公司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案等。

以文強涉黑案為例，公眾關注之強烈、爭議之激烈均屬空前。2010 年 4 月 14 日，一審判決文強犯受賄罪、犯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強姦罪，判處死刑並決定執行，文強提出上訴。重慶市高院於當年 5 月 21 日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經最高法院核准，文強被依法注射執行死刑。文強曾叫囂「不判我死刑就罷了，要是判了

我死刑，沒那麼便宜，我什麼都要說出來，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其肆無忌憚，顯示出部分官員的貪腐與猖獗，已到了令民眾與社會無法容忍的地步。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黎宏認為，「文強案的審結不僅是重慶 2010 年「唱紅打黑行動」的高潮部分，也是我國打黑除惡行動史上值得重筆的一筆，具有里程碑意義。」

### 突破傳統理念禁區

妥善處理重大敏感案件，必須突破傳統理念禁區。長期來，我國對涉及政治類、倫理類、間諜類等「特別敏感」案件，往往採取「不公開」辦法，生怕引發公眾不滿、社會動盪或國際爭端等等。但近年發生了很大變化，僅舉兩例：

一是大學副教授聚眾淫亂案。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馬堯海建立了「同好遊戲」QQ 群，聚眾進行淫亂活動。秦淮區法院一審認定 22 名被告人均犯有聚眾淫亂罪。馬堯海被判刑三年零六個月，其餘 21 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二年零六個月以下不等有期徒刑，或免予刑事處罰。馬堯海對「成年人之間自願參加性聚會是否構成犯罪」持異議，提出上訴。江蘇省高院二審維持原判。此案引發了諸多爭論，也取得諸多突破性收穫。首先，判決確認「性聚會」符合「聚眾淫亂罪」特徵，尤其是對「公共秩序」不是「公共場所秩序」、「公共生活」不是「公共生活場所」的認定，突破了機械主義的咬文嚼字，體現出較高的刑法理論水平。其次，該判決再次確定了「性聚會」行為刑法否定評價的必要性。馬堯海等人通過現代傳媒方式聯絡，影響面廣，不僅有損家庭穩定，有悖倫理道德，而且對社會治安和傳播性疾病等都具有潛在破壞作用，刑法干預完全是必要的。該案判決對社會具有警示意義，也對司法機關處理類似案件具有指導意義。

二是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講課中涉及的間諜案，視頻被放到 YouTube 上，引起世界媒體空前關

注。但所涉案例沒有一件屬於「泄密」，只是中國媒體過去不報道，或報道口徑與金一南所講不太一致。金一南認為，「哪個國家不出間諜案？哪個國家官員沒有中外國間諜「美人計」的？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公務人員隊伍龐大，薪水不高，又是理想信念受市場經濟衝擊最厲害的時候。而中國恰恰是境外情報機構最感興趣的地方，中國如果不出一些間諜案，那才是奇怪的。」按傳統理念，間諜案最「敏感」，官方從不願提「間諜」二字，認為間諜比貪官「更見不得人」。所以，間諜高官總是以「腐敗罪」判刑。有媒體指出，「應當讓間諜罪去神秘化」，細節可以保密，但間諜罪應公之於眾。世界很多國家都是這麼做的，並沒有損害國家安全利益。有人擔心這種公佈會損害外交關係，其實這種擔心是多餘的。西方國家不斷高調公抓了中國間諜，我們何必有那麼多顧慮？事實證明，國際關係對間諜案的承受力，大大高於我們的傳統理念。

### 建立化解防範機制

筆者以為，上述最高檢《意見》中提出的三大機制很有必要：一是大力推行和完善逮捕必要性證明和審查機制；二是建立健全執法辦案風險評估預警機制；三是全面推行偵查監督說理機制。多年來，國家各級政法部門創造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相關機制。比如株洲市石峰法院「六個積極」機制，積極加強組織領導，積極爭取政府和上級法院支持，積極落實調判結合原則，積極邀請執法監督員全程監督，積極構建應急反應機制，積極把握輿論導向。可謂防範機制的成功創新。再如江蘇省港閩區檢察院主動接受外部監督，創造性地將檢察機關辦理的「大幅度從寬案件聽證評議、重大存疑不訴案件公開審查、重大不批逮案件公開說理」三類敏感案件納入人民監督員監督範圍。這些機制對於進一步深化檢務公開、促進司法公正，都取得較好社會效果。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